

平克維樞著

尚仲衣譯

蘇聯的科學

商務印書館叢行

Albert P. Pinkевич 著  
尚仲 衣譯

蘇聯的科學與教育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34120)

蘇聯的科學與教育一冊

Science and Education

in U. S. S. R.

每冊定價國幣肆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Albert P. Pinkевич

譯述者 尚仲衣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  
\*\* 版權所有必究 \*\*  
\*\*\*\*\*

(本書校對者胡達鵬)

徐

## 譯者序

在十九世紀末期掌握着世界教育最高權威的是德國。即至十九世紀轉入二十世紀時，美國隨着社會的巨量開展，建立了精闢的教育學說，倡導了有力的教育主張，逐一躍而越過歐陸諸國，掌握了教育的領導者地位。

這個局面維持了三個年代。

現在世界上教育的一般領導權，似又有了移動，而搖擺於美國與蘇聯之間。

對於這個致力於教育實際，活躍於教育理論的新興國家之教育文化活動似乎不容我國教育研究者，再度忽視。

年來，中國教育迎頭所遇到的各種問題，如生產技術教育與普通一般教育之孰重孰輕，學校量上的擴展與質上的提高孰緩孰急，以及最近所感覺到的識字運動之推廣，義務教育之普及，少

數民族教育之設施等等迫切的問題，在世界教育轉替過程中，似已得到明確的解答。尤其是關於科學、教育與社會之間的密切聯繫，並已示吾人以明例。

第二莫斯科大學教育學教授及教育科學研究所主任 A. P. 平克維樞教授 (A. P. Pinker-vich) 於本年二月在倫敦出版蘇聯的科學與教育 (Science and Education in U. S. S. R.) 一書，概述蘇聯溶合教育理論與實施之種種努力，一掃過去基於觀念論諸教育原則。並將蘇聯在解決這些問題過程中所遭遇之困難以及其所得之收穫，一一給以具體論載。這種生產與普通教育之平行發展，學校量上與質上等量提高，科學與勞動攜手並進之記錄，對於中國科學與教育研究者，實不無參考價值。故特將此書審慎逐譯，介紹於讀者。

平克維樞教授執筆為此書時，係蘇聯第二五年計劃期間之第二年，而其討論則係根據於第一五年計劃與第二五年計劃初期之材料。為使讀者對於蘇聯之教育發展得一完整觀念起見，特將其所根據之第一五年計劃方面的文化與教育建設之基本原料一併轉錄於後。

尚仲衣一九三五，十月十五。

## 關於 A. P. 平克維樞教授

A. P. 平克維樞教授 (A. P. Pinkевич) 生於一八八四年。他於一九〇九年畢業於喀桑大學的物理數學系。他在學生時代曾專門致力於地質學，並且參加過許多地質探險的工作。得學位之後，大學方面擬委之以教職，但因為他的政治嫌疑（他曾參加革命運動，其後被監禁）為政府當局反對而作罷。

從一九〇九年到一九一七年平克維樞在中等高等教育機關中擔任工作。在此期間他著作若干關於教育的書籍以及地質學的教科書。一九一七年他被聘為列寧格勒的高等教育研究所的教授，旋於一九一八年被任為新組織之赫爾尊 (Hertzen) 教育研究所主任。

從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四年，在赫爾尊研究所的工作之外，平克維樞還擔任列寧格勒大學的教授，並在列寧格勒其他高等教育機關中擔任講師。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三年間他充任列寧

格勒科學工作人員待遇條件改善委員會的副主席，主席爲麥克斯謨·高爾基。

自一九二四年以後，平克維樞教授，在擔任科學教育研究所主任之外，並在第二莫斯科大學中服務。同時平克維樞教授還在莫斯科幾個其他的教育機關中——第一莫斯科大學、蒲里哈諾夫研究所等處擔任講師。一九三二年他被派充新組織的全聯邦高等技術教育委員會的委員；並係教育方法委員會的主席。同時平克維樞教授還在莫斯科各高等教育機關中繼續其教授職務。自一九一七以來，平克維樞教授曾在教育範圍中發表許多著作：《教育學上下二册》、《教育史》，一種關於裴斯脫洛齊（Pestalozzi）之專著，美國的無間生產方法之實際，等等。平克維樞教授的論文與著作業已有了烏克蘭文、喬爾基亞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日文、英文及其他各種文字的譯文。

# 目次

導言	一
第一章 蘇聯的國民教育系統及其實現普及教育之鬪爭	一〇
第二章 學前教育	三九
第三章 初級與中級職業教育	四七
第四章 高等教育的系統	五八
第五章 蘇聯的科學研究工作	八九
第六章 成人教育	一三二
第七章 少數民族的文化與教育	一四七
第八章 結論	一六五

附錄 蘇聯第一五年計劃中的教育建設……

# 蘇聯的科學與教育

## 導言

舊俄羅斯帝國是在貴族及商業階級支配之下的龐大的半封建的農業國家。人民均淪陷於窮困與愚昧無知的狀態之中。工業普洛利塔利亞在數目上比較少，而在革命的鬪爭中則飽受堅強磨礪。那時受過高度教育的知識份子為數甚少，而且多半是來自資產階級。

國家在自然富源上是極為豐富的；但是這些富源卻頗少開發，而且僅用為少數將國家作為其私有之朋黨的致富捷徑。經濟的與文化的落後是與對勞動大眾之政治上不可思議的壓迫攜手前進。從斯莫列·葉星 (Stenka Razin) 與布格契夫 (Pugachev) 時代起直到現世紀，農民不斷地爆發騷動，焚燬地主的財產，殺戮沙皇的憲兵與公務員。(註)

這些騷動大抵都很殘酷地被撲滅下來，只有在一九一七年當工廠工人掌握了革命運動的領導權之時，農民在他們的領導之下，與他們聯合起來共同作戰，方斬絕沙皇的統治。

國民教育在那時是在一種低之無可再低的水平上。政府終日繫念於人民反抗的騷動，自然無興趣籌設一種廣闊範圍的國民教育。當然它不能不僱用若干文化工作人員，雖然它十分瞭解普及教育必然能招致一種非常真實的危險。

所以，歷任的國民教育部長之所以均發表言論反對人民的普遍教育，這是無足怪的。例如，在前世紀的三十年代，席西柯夫(Shishkov)部長，將教育比作食鹽，應當很有節度地應用，並且宣稱「教導一切的人民讀書與寫字，必然會發生弊大於利的現象。」在九十年代中，國民教育部長捷利昂諾夫(Delejanov)擬成了若干法案，禁止工人和猶太人的兒童進中等與高等學校。他希望這些法案能將「馬車夫、侍役、廚役、洗衣婦、小商人等等人的兒童，以及那些決不應當希望入中等和高等學校的人民的兒童」都擯之於高等學校預科及預備學校的門牆之外。甚至於在二十世紀沙皇的極為寵幸的顧問之一K.P.色別唐諾斯冊夫(K.P. Pobedonostsev)企圖證明，教育對

於農民們是有害的，因為教育足以使他們不滿意於其工作及其生活形式。

無怪於十月革命之前夜，人民的百分之六十四都是文盲兒童的絕大多數均未就學——而就學於中等學校的都是特殊階層的兒童，並在一萬五千萬的人口中，大學學生的數目總計僅為十二萬。

在沙皇治下，科學之發展亦極為遲緩，而且即使其有所進步，亦係遭遇極大阻障而來的。當那些卓越的科學家們，冒着其工作上的一切困難條件，努力去完成重大的結果時，卻發現他們自己無力建立自己的學術系統，亦無力使其研究更進一步地向前推動。政府在其應付各大學與科學家時，始終拘定一種相當審慎的態度，因為它十分瞭解，一個真正的科學家必然脫離不了人民的要求。

在學生們不斷地宣佈罷課，組織公開的抗爭的時候，各大學遂成了革命思想傳播的中心。沙皇政府如非因其尚需要若干最少數目的律師、醫士、工程師、教師等等，他必樂於將一切大學完全封閉。政府用盡他所有的威權，以壓服革命的學生和教授；各監獄終年充滿着成千累萬的學生，而

其中許多均被放逐到西比利亞。他們時常受政府懲罰而被迫徵入軍隊。教授們的遭遇亦不比學生們為佳；他們在國立大學中時常不能繼續其工作。

專制政體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和十月革命的暴風雨中顛覆下來。在二月與十月之間的時期中，臨時政府絲毫沒有改進國家的文化生活。布爾扎維克則不然。緊隨着政權的奪取，布爾扎維克便立刻推進一般的教育、科學與文化。

在那時新的敵人們會斷言過，蘇維埃政府不久即將消滅。他們常常喜欣提及的論證之一，即是社會主義僅只能建立於一個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的國家。列寧在他十月革命一論文中，如此答覆孟雪維克的蘇哈諾夫（Sukhanov）：『你說，社會主義的建設需要一種高度的文化。但是我們為什麼不能在我們國中首先創造高度文化之那些先決條件，如地主及俄羅斯資本家之驅逐等，然後開始向社會主義的運動而前進？你在何種書籍中曾讀到歷史慣常順序的這種變遷是不能容許的，或者是不可能的？』

蘇維埃政府自其誕生的第一日起，即將列寧所指示的那種創造一種高度文化的各種先決

條件之任務加諸其自身，在那新生之蘇維埃共和國爲其生存而戰鬪的時日中，一般人時常引用『戰線』這一名詞——第一戰線，第二戰線，第三戰線。

第一戰線是指着反對國際的武裝干涉，反對內戰中企圖恢復沙皇專制政體的國內敵人之鬪爭。

第二戰線是指着國民經濟的再建設之鬪爭。

第三戰線所指的就是關於文化與教育的。

教育與文化之所以佔着第三位是爲着提醒一般人，使之明瞭在那些時日中最重要的事件，乃是保衛國家之生存並提高工業和農業使之達到文化發展之所必需的水準。

逮至在經濟的領域中，戰前的水準一經達到而且超過之時，當國家加諸其自身趕上並超過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新任務時，高度文化的諸先決條件纔有了保障，而文化與教育的『戰線』在這時便立即獲得與第一、第二戰線相較毫無遜色之重要地位。

這種文化與教育的鬪爭是具有其雙重性質的。在一方面它是爲着要把握人類在過去年月

中所積累的全部知識，而進行的鬭爭——這種知識的遺產是布爾扎維克所決不放棄的；它在另一方面是爲着要創造一種普洛利塔利亞其性質的新興文化之鬭爭。

若欲使蘇維埃生活之國外的觀察者不致陷入於深度錯誤，我們必須將這種似乎二元性的形情形中所包含的矛盾徹底消滅。列寧與施塔林關於這個問題的意見，可以供給我們一種最清楚的解釋。

列寧時時寫道：「只有那種以人類創造出來的知識之全部富藏，來充實其思想的人，方纔是一個康謨尼斯特。」他最喜欣說：「普洛利塔利亞文化不是一種從虛空中產生的，不是什麼普洛利塔利亞文化專門家之所發明的。這樣的觀點，完全是無稽之談。普洛利塔利亞文化，必然是人類在資本家地主與官僚社會的壓迫下所創造出來的知識全部富藏之邏輯的發展。」所以根據列寧的解釋，普羅利塔利亞文化這一名詞的「含義，是普洛利塔利亞在奪取政權之後，必須將人類的思想與文化，在長期發展中之有價值的一切材料，均精熟地把握住，並將其加以徹底整理，並且在整理中應使之適合於其自身的利益，使之適合於其自身對於世界的歷史觀。」

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期間中，普洛利塔利亞，當其爲一種無階級的社會而鬪爭的時候，它是一個爲着其自己的階層利益而戰鬪的階層。但是這種利益卻存在於階級之全部消滅之中。此之所以列寧對於下面這一點是如此的重視：『在蘇維埃工人和農人的共和國中，整個的教育系統，在一般的opolitical education 方面並在較爲專門的技藝方面，雙方均必須以普洛利塔利亞之階層鬪爭的精神，激勵起來，以實現其專政的目的，——布爾喬亞之推翻，——以消滅一切的階層，以廓清一切人創創人的制度。』

施塔林亦曾發揮與此精神相同的意見。在討論到提高蘇維埃共和國中過去的各個個別民族集團的文化水準的問題時，他解決了另一種近似矛盾的現象：普洛利塔利亞文化之社會主義，其內容而民族其形式的現象。『社會主義是向着人類文化的必然途徑——社會主義其內容，民族其形式——而前進的。』在另一處的文字中，他寫着：『普洛利塔利亞的人類文化不惟不排斥民族文化，而且還承認民族文化，同時並將其加以培植，一如民族文化之不惟不棄卻普洛利塔利亞的人類文化，而且還補充之，充實之。』

列寧在去世之前不久會使『文化革命』的口號普遍於世。蘇維埃政府的反對者曾說，在一個文化落後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實屬魯莽無知之舉，布爾扎維克的出發點根本錯誤。當列寧提起此種論點的時候，他說，『在我們國家中，據一般情形看來，政治與社會變遷，實係文化變遷的先驅者，而到現在，這種文化革命卻成了我們目前的工作。』

列寧又寫道，『如果我們想成為一個徹底的社會主義國家，這種文化革命是必需的；但是對於我們，這種文化革命在純粹的文化性質方面（因為我們的人民多半是文盲。）與物質性質方面（因為文化需要一種相當發展的生產手段，需要一種相當的物質基礎，）均具備着許多不可思議的困難。』

列寧所討論的文化革命，現在在蘇聯已在逐步實現之中。羣衆業已千百萬的參與文化的闡爭。全員已經有三千三百萬的兒童在幼稚園，初等與中等學校中就學，約有三千萬的成人受着各種形式的教育。就其正確的數目講，全部人口中幾近半數均在進行學習與研究。廣大的工人羣衆都在工廠中從事於學習的工作。大量數目的集體農民亦在進行學習，並且從其學習中而得以克